

# 挖掘馆藏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稽古·贯通·启新

□ 张志清

“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10月10日在国家图书馆正式拉开帷幕了。在此后历时3个多月的时间里，北大历史学系11位名师分15次，把中国通史做一个完整的勾画。在整体勾画中还以新史料、新方法突出每一断代史研究的热点，并向大家介绍扩展阅读的书籍。这个豪华阵容的出征，是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和国图副研究馆员、毕业于北大历史学系的郑小悠博士共同策划的，得到了各位名师的支持，得到了国图韩永进馆长的高度认可。国图十分荣幸作为文化殿堂、学习平台，来承载名师们宣讲的、我们可爱祖国所经历的、漫长而厚重、苦难而光辉的历史，也以此纪念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一生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这些话语重心长，把历史典籍的作用说得非常透彻。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史记》最早的三家注本——宋黄善夫家塾刻本。每当看到这部典籍历经千年饱经沧桑、触感柔软但质地坚韧的纸张，每当看到这部典籍漆黑油润的墨色和刀斧般锋利的刻字，就仿佛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当然，《史记》对保留华夏五千年历史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在它面前，我们只能肃然起敬。

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历史文献典籍最大的收藏地，也是一个优秀的阅读平台，一直致力于挖掘馆藏经典，弘扬传统文化，为广大读者提供免费、优质的终身教育。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在开展的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也非常重视对古籍的利用。9月28日，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14家公共图书馆，发布了8000多种在线古籍，无偿提供公众阅览，使典籍量达到2.7万部，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同一天，《永乐大典》展也在国图开幕，为读者讲述这部典籍的重要价值和悲欢离合的历史。这些都是国家图书馆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的名师们用他们智慧的头脑把平生研究的真知灼见分享给大家，引导大家阅读、研修中国古代史，这是难得的机遇，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满满的收获，也相信讲座一定能得到各界读者的喜爱。

最后，我还要解释一下“稽古·贯通·启新”几个词的含义。“稽古”是对历史的态度。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下令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意思是“朕我考察古史，崇尚文教，以书为鉴，治国理政。万机余暇，尊典重学，每天一贯，孜孜不倦”。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贯通”是学习历史的方法。近代理学大家马一浮先生说，光有知识还不能称之为学问，要在一个“通”字上下功夫，知行合一就是求“贯通”的认识论，就是弄懂这门学问的方法。“启新”是研学历史要达到的目的。材料要新，观点要新，方法要新，“新”是学问的着力点，也是学问的功用，今天，党中央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启新”以更深的含义。我们用“稽古·贯通·启新”这个原则来贯穿系列讲座，希望每位读者都能有所收获。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在“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开幕式上的讲话节选。标题系编者所加。）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右）向捐赠者代表、北大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左）颁发证书。

## 北大历史系十一位学者开展『中国通史』讲座 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 张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国家图书馆一直有比较多的合作关系，比如，北大为国图输送了很多人才，研究人员经常要到国图来查阅资料等；而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重要文化机构，举办了大量讲座，有单独的、也有成系列的，我自己就参加过好多次。这次讲座与以往又有不同，是由北大历史学系老师联合，按次序将中国古代历史的线索进行梳理，一方面是为了服务大众、普及史学观念与知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北大历史学系老主任翦伯赞先生诞辰120周年。

在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批新的史学家（如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中，翦伯赞先生作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入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对北大历史系影响很大。他在世时，曾任主编，带领当时北大中青一代教师编写了一套《中国史纲要》。这套书也是国家高等学校历史学本科教育中影响最大的一本教材。后来陆续出了很多教材，包括我自己也写了不少，都深刻受到翦老这套书的影响。今年是《中国史纲要》首次出版55周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举办一个通史学讲座，也是对翦老的纪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在“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开幕式上的讲话节选。标题系编者所加。）



### 相关链接：

翦伯赞（1898 - 1968），湖南常德桃源县人，维吾尔族，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出的教育家。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早年即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问题，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等，并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等。



# 碧落黄泉之间的古史记忆

## “中华文明的曙光”讲座回顾

□冯坤

2018年10月19日下午，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刘绪教授于国家图书馆文会堂发表题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史前和夏”的演讲。这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大型系列讲座“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的第二讲。现场气氛火爆，座无虚席，又由光明网同步进行视频直播，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方便未能及时到场的读者。本讲从我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文明源头切入，拉开系列讲座的序幕，带领我们投身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越是古老的历史，越要依赖新近的学术成果。面对上古历史，我们拥有的文献资料多来自口传记述，与所有悠久的传说相似，混杂着原始思维、神秘色彩，以及一代代讲述者的价值取向与有意建构。司马迁写作《史记·五帝本纪》时，已经困惑于传说材料的处理。他认为当时的文献中，《尚书》只从尧开始写起，而诸子百家的早期记载看上去并不可靠，儒家记述的“五帝德”与“帝系姓”也并没有得到儒者的普遍承认，于是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考察风土人情，收集民间传说，参照《春秋》《国语》中的古史谱系，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到近代，史学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得以建立，古史又必须经历严苛的审查，从中划出明晰的分野，区别开理性与神秘、隐喻与直笔、本事与建构，哪些材料足够客观，可以用于科学的审视，哪些材料只能停留在传说时代。这是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填补传说时代留下的空白，有这样一些成果：民俗学、人类学的考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以及在今天地位最重要的考古学的发现。殷墟的发掘是划时代的开端，既培养孕育了我国独立自主的考古学学科，又通过出土文字材料与传世历史记载的互证，使商代历史成为可靠的“信史”。而对于更古老的、目前尚未发现文字材料的时代，我们如何安放我们的历史记忆，要穿越更多的迷雾，串联起更多的信息。

刘绪教授是系列讲座中唯一来自考古文博学院的演讲者，讲座主要从二里头文化及之前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来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文明”如何定义？标准并不统一。按通

常的说法，文明的形成以文字的产生、金属工具的使用、城市的出现（包括大型礼制建筑）为主要标志。在文字方面，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与金文。郑州商城出土过可能在商代早期的甲骨，由于发掘时扰动地层信息，不能得以确证。商之前发现有早期刻画符号，仰韶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均有出土。刘绪教授认为文字在成熟前应有发展过程，商代以前文字当已存在，没有发现或许另有原因。在铜器冶炼方面，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如仰韶时期西安半坡出土白铜片、临潼姜寨遗址出土黄铜片；此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发现青铜器物，但均属小型器，未见完整的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和生产工具，因此不属青铜时代，一般称为铜石并用时代。而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时代常见的器类基本都已出现，尤其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铸造，可以作为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表明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文明已然形成。关于城市的兴起，我国最早的城邑出现于仰韶时期，发现少且规模不大；



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址陡然增加，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大小均有。修建大型城址必有组织者，由此或可推测高级权力机构的存在。此外，刘绪教授基于等级制度的形成，又补充了文明的两种考察维度——墓葬中的等级差别，以及人殉、人牲的流行。综合与文明起源有关的现象，可以看出，上述各项的发生、发展与发达过程不完全同步，有早有晚。龙山时期的文明化程度较高，为国家出现的前夜；而二里头时期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出现。

讲座以二里头时期为文明的开始、国家的起源，并由此将其对应到传说中最早的王朝——夏。讲座也总结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特殊性，文明的发展由分散到集中、由周边到中原，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格局与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文明跃居领先地位，我们经常说的黄河文明由此凸显，二里头所占据的中原地区也为其后的历代政权所继承，引以为正统。这是一个从多元走向

一体的文明，在建筑、青铜冶炼上，在文字、历法上，都具有鲜明的独特之处。

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基于独立的点，有待进一步系联；基于客观的物，有待更多的拟测。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能否直接对应，或许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进一步讨论。古史传说是携带我们早期记忆的珍贵资源，如果将其完全忽视无疑将令人遗憾；但我们利用传说来考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传说与记载全部可以得到“信史”一般的一一对证。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回顾我们从哪里走来，这是一条复杂的学术之路，既不可陷入民族主义的盲目热情，也不可滑落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经过考古材料的发现与梳理，我们的早期社会如何复杂起来，如何迈向文明，如何产生社会组织、形成集体记忆，已经是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而慎终追远的民族认同感也会因此油然而生。

# 卜辞与青铜的世界

## 听北京大学朱凤瀚先生讲商与西周的历史

□廷衷

戊戌年九月十八日（2018年10月26日），天气晴好，利于听讲座。

从地铁四号线国家图书馆站A口出，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五楼的文会堂，这里正举办“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

下午一点，讲堂现场的二百多把座椅已被慕名而来的各路听众坐满了，后来者有的试图找会务组的人要求再加一把椅子，有人则直接到前面地上坐下。两点钟，讲台前有十好几位听众席地而坐，其中还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年听众。

两点半，前后门挤满了晚到的听众，整个大厅“站无虚席”，但火爆的场面吓不住热情的听众，他们有人试图从门口挤到中间通道，那里稍微松快点，没有那么拥挤。

就在这时，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先生，背一双肩包，一袭黑衣，从讲演者通道匆匆登上讲台，他就是“甲骨与青铜的王朝——商与西周”的主讲人朱凤瀚先生。

讲座之始，朱先生展示了一幅日本学者绘制的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的四大文明古国示意图，从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相对应于其他三个古文明在

地域上的紧邻关系，中国的古文明处于遥远的东方，独立且一直未曾间断，非比寻常。这个古老的文明，从夏王朝（二里头文化）开始，有了美轮美奂的青铜器，有了成熟且能部分被释读的甲骨文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至少从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领土国家”。所谓领土国家，是由清楚的国王世系所构成的。从《史记》的记载到二十世纪初期甲骨文的发现，甲骨学的突飞猛进，以及随后考古学家对殷墟，也就是商王朝后期都城旧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使得商王朝的历史再次被印证，让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的文明状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专制王权、子姓族内的宗法关系对王权的支撑、商王朝的官制——“内服”与“外服”、王朝常备军——多射与多马、“领土国家”形成——“王畿”与“四土”、王朝与商人宗族组织之互动等若干层面来更深入地认识商王朝。朱先生还从甲骨卜辞中“眾（众）”的身份、殷墟墓地的形制和分布等，告诉我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历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再仅仅以奴隶社会之类的概念简单地予以解释；事实上，从考古发现来看，商王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平民才是当时



农业生产和军役的主力，而奴隶多为家内奴隶，不成其为社会主力。当时的宗教信仰则是一种以王室祭祀为中心的国家宗教，这不是一种单一的信仰系统，而是有着多元的祭祀对象，祖先和自然神灵都被人崇拜和祭祀着。

接着，朱先生简要讲述了西周历史，他认为西周王国是典型封建制国家，其特点是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封建为中心展开，所谓封建是以姬姓贵族为主体对周人所控制的广大地域封建的分封制度。这一制度对于中华文明的定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上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的西周侯国遗址，其分布范围从北到南，地域极为广阔，出土资料极为丰富，比如有北京

房山地区的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有山西曲沃的北赵晋侯墓地，还有湖北随州曾国墓地，特别是随州曾国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学界对于西周封建地域的认识。朱先生讲，相对于商王国的信仰体系，西周时期形成的“天命”观与礼制秩序对于王朝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天命，不像甲骨卜辞中所显示的商王国时期的那样不可捉摸，而是可以通过人的德性和德行得以确认，因此周王朝贵族逐渐形成了一种“敬德”的天命观，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种天的秩序，人世间也有礼的秩序加以维系。礼既有“作册”“用鼎”等制度化、仪式化的规范，也有世袭官制的政治制度保障，

还有以贵族作战义务为主的军事活动为后盾，更有家族内的家臣制度作为支援体系。朱先生认为，西周时期通过王朝藩屏的建构，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等等，使得“领土国家”进一步成熟，对以后中华文明的走向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最后，朱先生还对商和西周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西周的封建制度开辟了新的国家结构形式，而天命观和家臣制度则分别有宗教的政治化和官僚制度化的意义，这是最为明显的差异点，而两个王朝的共同点则有专制王权、世族世官、王朝常备军、领土国家、祖先崇拜、宗族行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史从商王朝和西周来看，并没有公民或者贵族议会制度。

朱先生准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大量的考古图片，包括很多古代器物的图片，还有甲骨文、金文图片等，他略带着南方口音为在场的数百听众展示了极为丰富的早期中国历史积淀，以及当代中国史学界关于早期中国历史的最新学术成果，在原定的两个小时之外还多讲了半小时，听众仍意犹未尽。有的观众甚至在现场听完后，又回家多次观看在光明网的直播视频。